chinaXiv:202310.01098v1

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的发展历程

孙宝传
（新华通讯社，北京 100803）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报刊、新闻印刷、新闻摄影、新闻电影、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媒介的发展历史，记录党的新闻传媒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以期为当下传媒人了解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革命战争时期；新闻传媒；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传媒技术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05-007-06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05.001
本文著录格式：孙宝传．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的发展历程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05）：7-12.

导语

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新闻工作者，克服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军事围剿，以及日寇的侵略扫荡和“三光”政策等种种不利因素，发扬自力更生、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使党创办的新闻传媒事业在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从周刊月刊到大型日报，从秘密传报到公开发行，党的报刊传媒不断发展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就创办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和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和价值，很早就受到党领导机构的重视，并利用各种渠道，想尽各种办法，很快就创办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报刊杂志。

1922 年 9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3 年《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之后又创办了《前锋》等月刊，相互配合、共同担负起党成立初期的宣传报道任务。1925 年 5 月 30 日“五卅”惨案发生，《向导》作为一份周报，无法满足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创办一份日报来加以及时的宣传和引导。同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版一份日报，由瞿秋白负责主编，并抽调人员组成编辑委员会进行筹备。6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从决定到出版仅用了 4 天时间，这种速度放到今天恐怕也是罕见的。编辑部就设在闸北中兴路一间破旧的平房里，设备十分简陋，写字台是用几块木板拼起来的。当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办一个印刷所，但来不及开工，因此《热血日报》由公共租界梅白格路（今新昌路）的明星印刷所承印，后来明星印刷所被查封，便转移到会文路一条弄堂里的地下印刷所印刷。八开四版的《热血日报》的销量曾达到 3 万份左右，尽管面世不足一个月、仅出版了 24 期就被强行查封，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新闻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建立起了地下报刊系统。1927 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转来上海，同年 10 月，党中央决定组成由瞿秋白为主任的 5 人编委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10 月 24 日，《布尔塞维克》在上海长宁路路边的一个旧宅内创刊，到 1932 年 7 月 1 日出最后一期，一共出版了 52 期。1930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上海创刊，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发行，发行量达 1.2 万份，直到 1931 年 3 月 8 日被迫停刊。在红区（共产党领导的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于 1931 年 12 月 11 日在江西瑞金创刊，为四开周刊，以后又改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它与“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初成立时编辑部仅有几张桌子、两三个编辑，外加两个报务员，发行量约为 3000 份。“红中社”1931 年还编印出版《无线电材料》（1933 年改名为《无线电日讯》），它是《参考消息》报的前身，采用刻蜡纸、油印机印刷，每期四五十份，供中央领导了解敌情、判断形势之用。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后，《红色中华》报一度停刊，1935 年 11 月 25 日在瓦窑堡复刊，由中央印刷厂铅字印刷。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一张公开的日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日寇侵略者。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1938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在抗战烽火中于

chinaXiv:202310.01098v1

武汉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创办的、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张大型日报。1938 年 8 月日寇进犯武汉，10 月 25 日《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出版。由于无法搬迁笨重的印刷机器，就用平板机、油印机代替轮转机，用木刻字代替铅铸字，用木刻素描代替铜版照片，用当地土制纸代替正规的新闻纸，在日机空袭停电时，就用手摇印刷机代替电力驱动的印刷机，从而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新华日报》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种种迫害和压制，纸张封锁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曾多次对其部下说："要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不好办的，不准商人卖纸给他们，不许经济部给他们分配纸张，他们就会自己关门。"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社决定秘密自办纸厂。先建了个川东复兴纸厂，被国民党发现停办后，又另行筹建了建华纸厂。此外，还在梁山办过文华纸厂、正大纸厂，在大竹办过正升纸号等。《新华日报》日发行量最高增至 5 万余份，但从未因缺纸少印过一张，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国民党统治区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

在各抗日根据地，各种小型报刊纷纷创办，数量庞大，仅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 1939 年前出版的小型报刊就达 700 余种。1939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办好各省委、区委及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的党委机关报，形成各大根据地的宣传中心，从而提高了各级党报的质量，其中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最为突出。该报的前身是 1937 年年底在河北阜平创刊的《抗敌》报。初创时，用的是原始的油印机，稍后改为石印机，1938 年 4 月才用上铅印机。但铅字不够用，工人们想法自己制作铅字；没有油墨，工人就用老乡家的锅底烟灰自制。为便于轻装转移、适应战争环境，把笨重的排字架改成可装可卸的轻便排字架；把重约 1 吨的石印机改造成 250 公斤的铅印机，进而改造成重约 30 公斤更加轻便的木质印刷机，一头驮骡就可以拉走，而且拆卸装配非常方便。他们把报社的全部设备装在 8 匹骡子上，创造了"八匹骡子办报"的奇迹；他们为便于机动转移、想法减少携带的铅字，尽量在 3000 个常用字内做文章，因而有"三千字内著文"的佳话；[1] 他们把铅印机安放在石头围成的只有几平方米的牛圈里印报，一有敌情就把印刷机和铅字埋藏起来，敌人一走再挖出来接着印报，最多的一次，7 次埋下机器，又 7 次挖出印报，书写了"七进七出游击办报"的红色轶闻。《晋察冀日报》从 1937 年创刊至 1948 年终刊，共出版 2845 期，从发行几千份增加到几万份，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区党报之一，先后有 59 名烈士为此付出了生命。1948 年 6 月，《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成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再后来成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7 年 1 月 29 日《红色中华》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1939 年 2 月 7 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发行量增加到四五万份，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报纸。毛主席评价该报 "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此外，1937 年到延安后，《无线电日讯》改为《今日新闻》报，初期仍油印出版，1940 年 3 月 10 日改为铅印，由中央印刷厂印刷。1941 年 5 月 16 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2. 边打游击边办印厂，既秘密引进设备又自主革新技术，党的印刷事业日益壮大

印刷是革命舆论宣传不可缺少的传媒工具，1927 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地下印刷所，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印刷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印刷工作十分重视。1938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印刷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在 1939 年到 1940 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一开始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后来又要求"每一个较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再后来进一步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2]

根据中央的要求，为动员全民抗战以及革命宣传的需要，各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印刷厂（所）。由于日寇的扫荡围攻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加之根据地多处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在印刷技术和设备相当落后、专业人才和印刷器材极度缺乏的极端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坚持出版报刊、书籍。没有纸张，各根据地就自己办造纸厂，用麻绳头、破布、稻草、麦秸等做原料手工造纸；设备也很简陋，一盘石碾，一口大井，几只蒸锅，再砌上几个大水池，买上几张竹帘子就齐了。没有油墨，就发动农民拔锅扫锅底烟子，加上松香、胡麻油、蓖麻油等调制成土油墨。没有照相和制版设备，就用木刻或石印来代替。[3] 其中，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延安的中央印刷厂。

中央印刷厂是 1931 年在中央苏区建立的，在长征期间被迫解散，1937 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在延安清凉山的万佛洞得以重建。通过秘密引进和土法自创两条腿

chinaXiv:202310.01098v1

走路的方式，不断推进印刷厂的建设和改造。建厂初期，只有 2 台四开机、4 台对开机、1 台鲁林机，1 个圆盘机，以后又陆续增加了 3 台四开机、1 台对开机、2 台铸字机等印刷器材。[4] 设备都是由党的地下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在国统区购买，然后秘密运进延安的。例如，上海的地下党曾将印刷机拆成零部件装在棺材里，才骗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运到了延安。

在秘密引进设备的同时，工人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印刷技术的研究、改革和创新活动。没有纸张，他们就利用当地的马兰草生产马兰纸；没有油墨，他们用炭黑加桐油制成土油墨；没有铸字铜模，他们就自己动手制铜模；缺少设备，他们自行设计制造裁纸机、切书机、打样机和浇版机等，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没有电源时，他们就用脚踏、手摇启动印刷机。此外，他们还用毛边纸代替薄纸打纸型，解决了薄纸的短缺；改革排字架，提高了捡字效率；编写印刷技术书，加强了技术培训，等等。

当年，油印技术功不可没。不仅《红色中华》等报刊最初都是以油印出版（1937 年改名为《新中华报》后才由油印改为铅印），而且《实践论》《矛盾论》的初稿本，也是先以油印本流行的。石印技术，也充分发挥着作用，1944 年前后，《解放日报》编印的大量战场形势图都是石印的，而且印得很精致。铅印的生产规模和印刷质量上更是首屈一指。在国民党经济封锁、物资奇缺的艰苦的条件下，中央印刷厂的月排字量达 300 多万字，印刷纸张达 320 令，而当时全国最大的重庆商务印书馆，每月排字量还不到 100 万字。

3. 从木刻插图到新闻摄影，从照片上报到创办画报，新闻摄影渐成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创办报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利用摄影等传媒技术手段，加强报刊宣传报道的影响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办的报刊在进行文字宣传报道的同时，还尝试用新闻照片进行宣传报道。1922 年 9 月，党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就做了照片的纪实与宣传。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就曾利用新闻照片揭露 1925—1926 年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及万县惨案的真相。中共江苏省委办的地下报纸《上海报》，1930 年 4 月 9 日发表了该报记者有关上海工人、学生 8 日在南京路示威遭到镇压的现场新闻照片。

1929 年 12 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1931 年 12 月 11 日在瑞金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经常刊有反映时事的木刻画作为插图。1934 年 1 月 12 日，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了《红星画报》，用石印图画对红军进行宣传鼓动。1938 年创刊的《新华日报》在很长时间里，于报头右边每日刊登木刻一幅，并不时刊登新闻照片。

由于条件的限制，新闻摄影正式作为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一种宣传武器，是抗日战争打响以后的事。1939 年和 1940 年，晋察冀和冀中军区政治部相继建立新闻摄影科，沙飞和石少华分别担任科长，这是新闻摄影作为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开始。[5] 随之初露头角：1939 年 1 月在《军政杂志》第三期刊登《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在延安》铜版照片三幅；1941 年 4 月 14 日在《抗日三日刊》上第一次刊登新闻照片《边区人民反对内战》。

1942 年 5 月 1 日，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摄影器材，在河北平山县太行山一个名叫碾盘沟的小山村里，建立了晋察冀画报社，并着手创办党的第一个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解放军画报》的前身）。1942 年 7 月 1 日，装订出第一份画报作为对党的生日的献礼。16 开本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刊登了 162 幅照片，中英文两种文字，封面、封底刊登的杨成武支队向长城内外进军的《塞上风云》和一一五师骑兵营向冀西挺进的《沙源铁骑》，还是五色套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艰苦条件下，在缺衣少食的荒僻狭窄的山沟里，出版如此华丽的画报，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在敌、我、友三方均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日本侵略者把摧毁画报社作为“扫荡”边区的目标之一。为了应付敌人的袭击，画报社一面搬迁，一面挖洞，同时研制出轻便印刷机，研究成功用铁皮代替铜版的平版印刷法。1943 年 4 月的一次突围中，多人受伤，而雷烨同志未能脱险，自毁相机，开枪自尽，壮烈殉国。等敌人一走，画报社即恢复工作，赶编画报。1943 年 9 月，日寇发动了规模最大的“秋季大扫荡”，历时 3 个月之久。在 12 月 9 日突围中，画报社损失惨重，10 位同志牺牲，4 人受伤。画报社奉命迁到阜平洞子沟，减员到 26 人，但不到一个月，《晋察冀画报》出了一期《时事增刊》，对秋季反“扫荡”做了报道。两个月后，又出版了画报第五期——“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反‘扫荡’战役及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专号”。北平日军司令部的敌人看到画报后气得目瞪口呆。《晋察冀画报》的出版，对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相继产生了《山东画报》《战场画报》《胶东画报》《东北画报》《华北画报》等一大批画报。

解放战争初，一些摄影工作者和一部分热爱摄影的部队战士参加了新华社前线分社的摄影报道工作。1947 年 1 月成立的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摄影组是新华社第一个摄影机构。当时新华社还没有条件播发新闻照片，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1098v1

摄影记者拍摄的新闻照片主要用于举办战地摄影展览或提供《山东画报》刊用。不论是画报社还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都是作为党在新闻战线上的一支新军而活跃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并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新闻摄影工作者。

4. 两台摄影机，数千尺胶片，开启党领导的新闻电影纪录片的探索之路

20 世纪 20 年代，新闻摄影的一个新品种——电影新闻片流行起来。北伐战争时期，黎民伟等人曾拍摄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电影新闻片。20 世纪 30 年代中，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苏区拍摄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的珍贵历史镜头。

1937 年，以吴印咸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摄影师奔赴延安。1938 年 9 月，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电影摄制的专业机构。仅仅依靠 1 台由荷兰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赠送的 35 毫米单镜头 M 摄像机和数千尺胶片、1 台从香港买来的 16 毫米摄影机以及 3 台吴印咸个人出资购买的照相机，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新闻电影纪录片的探索之路。同年，吴印咸等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陕西中部黄帝陵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成为人民电影第一部大型纪录片。这个时期拍摄的反映延安精神的《南泥湾》、表现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记录毛主席给 120 师做报告的《艰苦创业》等电影纪录片，为我们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无价的历史珍品。[6]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先遣团即奔赴东北。1946 年 10 月 1 日，以延安电影团成员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1947 年 5 月至 1949 年 7 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派出了 32 支摄影小分队深入到前线、工厂和农村，冒着枪林弹雨拍摄、编制了 17 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真实记录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部分实况。

1950 年，文化部授予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人民电影先锋队”的荣誉，该队的前身就是延安电影团和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队。1953 年 7 月 7 日，在“人民电影先锋队”的基础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正式挂牌成立，其任务是以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5. 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从借用一部半电台起家，由茅屋通讯社、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一路走来

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在 1931 年 11 月 7 日，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的那一天宣告成立的。当时，红中社既没有自己的电台，用的是中央军委无线电队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一部半电台（两部电台中的一部在缴获过程中被不懂无线电的红军战士砸坏了，成了能收不能发的“半部”）；也没有自己的通讯技术人员，由中央军委无线电队的王诤、刘寅等担任。他们在大会开始前，抄收国内外（包括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向大会提供“参考消息”；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在离大会会场（叶坪村谢氏祠堂）约七八十米远的一户老乡家的土墙瓦房里，用从国民党第二十八师缴获的师长公秉藩 100 瓦的指挥台，以红中社的名义（呼号为 CSR，即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英文名 Chinese Soviet Radio 的缩写），首次发布了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及苏维埃政府声明、宣言等。[6] 因堂屋没有窗户，专门在后墙上开了一扇窗，把天线拉出去高高地架到屋顶上，被称为茅屋通讯社。

直到 1933 年 5 月红中社才有了自己第一个专门抄收新闻的电台，使用的是一部用缴获来的电台旧零件自己装配起来的回授式五灯收报机。新闻台设在瑞金县的一座破庙里，天线就架在庙外的大树上。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为北上抗日开始了长征，红中社跟随中央红军，一路上文字新闻广播停止了，但抄收新闻电讯一直没有中断，被称为马背上的通讯社。1935 年 11 月 25 日，红中社在陕北瓦窑堡恢复文字新闻广播，用的是缴获的 50 瓦发报机，由一部汽油发电机供电。

1937 年 1 月 13 日，红中社迁入延安城内的窑洞后，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成了窑洞通讯社。文字广播仍由中共中央军委三局负责，用的是自己组装的 100 瓦发报机，呼号是 QST de CSR。由于没有发电机，又缺少干电池，为了确保收讯任务的完成，从报务人员到社的最高领导都要在休息时间轮流手摇马达来保证供电。在延安期间，工作环境虽然十分艰苦，但通信业务和技术设备均取得了较大发展。在新闻广播方面：发射机功率由 100 瓦提高到 500 瓦；由单频广播改为双频广播；由单一的中文广播扩展为中英文双语广播；不仅有文字广播电台，而且有了口语广播电台。在收讯方面：由 2 部三灯收报机发展成 10 部四灯收报机，外加一部从美军观察组搞到的 AR88 收讯机；已能抄收国内外十来个通讯社的新闻。在通报方面：通报台从无到有、从 1 个增加到 4 个；设备也从 15 瓦哈特莱式发报机和四灯收报机各 1 部，发展到拥有 7–8 部从 50 瓦到 200 瓦的发射机；通报联络对象已发展到 19 个，总社与分社间的工作联系和业务指导大大加强，被称为窑洞通讯社。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新华社兵分两路，一路（即四大队）由范长江率领跟随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另一路（即总社大军）由廖承志社长率领南渡黄河，去和太行临时总社汇合。在整个转移过程中，新华社的口语广播、文字广播和收讯业务从未中断。

1949 年，新华社进入北平（即现在的北京），那时

chinaXiv:202310.01098v1

通信设备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共拥有 40 余部收讯机，20 余部发射机（其中包括 500 瓦 5 部，1000 瓦 1 部，3000 瓦 1 部），已能抄收约 30 个通讯社的新闻电讯，可同 23 个野战军总分社和独立兵团分社的通报台进行通信联络，并可向全国进行文字和口语广播。

6. 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因陋就简土法建，转辗千里不停播

抗战初期，新华社的文字广播，需要由收报机接收、译电员翻译才能阅读，一般部门和普通百姓是难以办到的。因此，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电台，使大后方和沦陷区拥有收音机的听众能够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就成为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1939 年冬，周恩来在苏联治病期间，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时，提出了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问题。1940 年 3 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时带回了一部由共产国际送的苏制广播发射机，党中央随即发出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指示，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为委员的广播委员会，负责筹建口语广播电台。由军委三局调集 30 多人组成九分队担负建台任务，下设调音组、动力组、播音组和文字广播报房。其中只有少数无线电技术人员，播音员有徐瑞璋、姚雯、肖岩等人。

广播电台的台址选在延安西北约 19 公里地势偏僻的王皮湾村。九分队的战士们，在当地老乡的积极配合下，在延河支流西川南岸的半山腰的岩石上开凿了两孔相通的石窑洞，作为广播电台的发射机房和动力间，在隔河相望的山坡上挖了两孔土窑洞作为播音室和备稿室，播音室门口挂了一块陕甘宁边区自己生产的羊毛毯，既做门帘又用来隔音。九分队的技术人员将周恩来带回的广播发射机改装后能供口语广播使用，改装所需的零部件大多是延安通信材料厂和九分队的技术人员用土法自己动手制作的。因陋就简地用几根大木杆子连接起来耸立在山头上，代替架设发射天线的铁塔。建台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动力问题，最后经王诤等人商量，用一个旧的卡车引擎带动四马力的发电机。没有汽油怎么办？他们想出了用汽油桶改装成木炭炉，用燃烧木炭后产生的一氧化碳来代替汽油。经过大半年的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在 1940 年年底初步建成，编制属军委三局，业务归新华社领导，广播稿由新华社广播科提供。

1940 年 12 月 30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试播，发射功率约 300 瓦左右，呼号为 XNCR，字母 X 系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中国电台的代号，NCR 是新中华广播电台英文名 New Chinese Radio 的缩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广播电台，标志着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

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广播事业的垄断，引起了重庆当局的惊恐和不安，曾妄图加以取缔，但其阴谋未能得逞。延安的红色电波还是冲破“新闻封锁”传向四方，一些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新闻机构一直收听和抄录延安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在大后方和沦陷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1941 年 12 月 3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日语节目广播，播音员是一位名叫原清志的日本反战女士，每周广播一次，每次 30 分钟。广播对象主要是侵华日军，广播内容主要是阐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揭露和瓦解日军，受到了日军大功率发射设备的干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开创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

那时，技术设备很简陋，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没有唱机，就请文工团来演唱抗日歌曲，有时播音员自己在话筒前唱一曲。1941 年夏，新华广播电台有了一台手摇唱机，但没有唱片。毛泽东主席知道后，把自己保存的 20 多张音乐和戏曲唱片送给了电台，并当面嘱咐延安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要认真把广播办好。广播电台由于发射机经常出故障，播音时断时续，因此，始终没有宣布正式播音。1943 年春，因发射机的电子管损坏，新华广播电台只好暂时停止了广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尽快恢复新华社口语广播。1945 年 8 月中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机房由王皮湾村迁到盐店子村寨子峁山上，距离三局机关所在地——裴庄只有两公里。寨子峁山高约 50 米，山顶上一间平房被用作发射机房，新增一部 500 瓦 BC–601 发射机。山腰中的几排窑洞做播音室和宿舍。9 月 11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恢复播音。11 月初，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应王诤之邀到裴庄视察了新华广播电台，并讲了话。刘少奇同志谈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你们是中央的耳目喉舌，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1946 年 11 月，周恩来在战备会议上要求新华社的文字广播电台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战争情况下不能中断广播。会议决定，立即在延安东北 180 里的瓦窑堡建立第一线战备电台，同时中央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建立新华社第二线战备电台。会后，新华社立即派人到瓦窑堡的好坪沟设立了新华广播电台的战备台。好坪沟是一个很小的隐蔽在山沟里的村子，村口有一座残破的小庙，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机房和播音室就设在小庙里。晋冀鲁豫中央局将战备电台的建设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电务科，并调集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涉县成立临时总社电务科。王诤也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通信处，尽快做好接替广播电台的工作。因广播电台设备太笨重，无法随军转移。恰巧在这之前，蒋机空运两部发射机到新乡，误在已被我军解放的焦作机场着陆。蒋介石这位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2310.01098v1

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来的发射机是长波导航机，经军区三处王士光改装成 300 瓦的短波广播机，从而保证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接替工作。1947 年 1 月，发射机改装完毕，连同天线安装、播音室布置和蒸汽机试车一次成功，之后，每天监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随时准备接替继续广播。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大举进攻我陕甘宁边区，我军主动撤离延安。3 月 14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完当天中午的节目后，奉命转移到早有准备的瓦窑堡。3 月 21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瓦窑堡好坪沟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继续广播。为了不让敌人侦察出电台所在地，白天停止播音，于是敌人就造谣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炸毁了"。可是，每到晚上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又传向四面八方。新华社有关陕北和全国战场的许多鼓舞人心的捷报，以及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一篇篇重要谈话和评论就是从好坪沟那座破旧小庙里播出的。3 月 25 日，周恩来、朱德同志先后到好坪沟进行视察，鼓励大家做好工作，保证不中断广播。3 月 28 日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播完我军在陕北战场上第一个大胜仗——青化砭大捷的战报后，结束了瓦窑堡的播音，并向太行转移。3 月 29 日，太行临时总社的发射机正式启用，接替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

1947 年 9 月 11 日，位于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出英语节目，播音员是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学生魏琳，这是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第二种外语节目。

1948 年 5 月，新华广播电台又从太行山麓转移到西柏坡，设在离西柏坡十几公里的张胡庄，有 3 部美制 BC–610 报话两用机，1 部 10 千瓦的汽油发电机，于 5 月 13 日开始广播。

1948 年上半年，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地区的宣传，由刘寅为建台办公室主任、李强为总设计师，在河北井陉县窟窿峰（后搬到窟窿峰西南的天户村）建起了一座 3000 瓦大型短波发射台，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发射台。发射机是在日本投降时我军缴获的日本造机器，共有 5 副天线，分别向南京、上海、欧洲和美国方向广播。为了防止做轰炸，专门修建了地下发射机房。广播电台于 1948 年 12 月底建成，交新华社使用，供文字广播、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使用。1949 年 1 月 31 日，新华广播电台随军队由西柏坡进入北平西长安街，接管原北平广播电台，随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2 月 2 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完成了长达两年的大转移，实现了广播不中断。

1949 年 6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适应广播事业日趋扩大的需要，中央已决定将新华总社的口语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全国的广播事业"。随之，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建制也由新华社划归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口语广播电台也就从新华社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机构。1949 年 12 月 5 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结语

本文以新闻媒介为视角，从党创办的报刊、新闻印刷、新闻摄影、新闻电影、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六个方面，梳理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事业发展的历史。面对当今新闻传媒业的机遇和挑战，传媒人应当以史为镜，学习前辈的创新智慧和革命精神，应对当前新闻传媒事业的挑战。谨将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媒

参考文献

[1] 香山革命纪念馆北京号 . 烽火中"游击办报"——晋察冀日报社的印刷机设计 [EB/OL]. 香山革命纪念馆北京号，20−07−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801654350747359&wfr=spider&for=pc.

[2] 曹国辉 . 延安时期的印刷事业 [J]. 新文化史料，1998（06）：40−41+50.

[3] 周岩 . 抗日根据地印刷工作者的历史性创造（三）[J]. 广东印刷，2001（06）：63−64.

[4] 魏文享，陈春兰 . 革命与印刷：中共领导下中央印刷厂的运营（1931—1945）[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02）：66−75+169.

[5] 蒋齐生 . 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6] 孙宝传，朱友芹 . 中国新闻传媒科技发展史话 [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孙宝传（1939−），男，浙江嘉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新华通讯社。

（责任编辑：李净 陈旭管）